

香港法治不容抹黑 外力干預注定徒勞

陳銳鋒評

每逢香港依法審理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西方反華政客與媒體便會例行公事地搬出「司法獨立受損」「自由倒退」等陳詞濫調。此番「支聯會」案裁決後，什麼「香港沒有公正的司法體系」「有關案件罪犯未能享受陪審團權利」「所有主審法官由政府挑選」「香港已非理想經商之地」謬論再次出現。看似言之鑿鑿，實則經不起基本事實的檢驗，不過是服務於西方反華政治需要的造謠和抹黑。

先說「司法公正」。香港司法獨立是《基本法》所確立的憲制原則，而非任何外部勢力的恩賜。《基本法》第八十五條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回歸以來，香港各級法院依法行使審判權，普通法傳統得以完整保留並延續發展。在國安法案件中，法院同樣嚴格遵循無罪推定、舉證責任在控方、被告享有緘默權和辯護權等普通法基本原則。指定法官制度並非行政長官為

某一特定案件指定某一位法官，而是制定一個法官名單，由這些法官負責處理國安案件；法官審案時只依據法律和證據，不受任何外部干涉。若以「指定法官」便否定司法公正，如同質疑所有設有專屬法庭的司法管轄區，其邏輯之荒謬不攻自破。

英同樣有「無陪審團」安排

次論「陪審團權利」。部分外媒刻意渲染國安案件不設陪審團等於剝奪被告權利，實則混淆了普通法制度中陪審團安排的性質。根據香港國安法第四十六條，律政司司長可基於保護國家秘密、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或保障陪審員及其家人人身安全等理由，發出證書指示相關訴訟毋須在有陪審團的情況下審理，而由三名法官組成審判庭。這一安排並非香港獨創，英國《2003年刑事司法法》等普通法地區立法中亦有類似規定，旨在應對涉及國家安全或陪審團可能受干擾的特殊案件。判詞早已指出，不設陪審團不影響被告人的訴訟權利，舉證責任、無罪推定、公正審判等

權利仍然適用，如同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在設有陪審團的情況下審理任何刑事案件一樣。將陪審團安排等同於司法公正的全部，既是對普通法制度的歪曲，也是對專業法官審判能力的攻擊。

三談「法官任命」。所謂「所有主審法官由政府挑選」，是對香港法官任命制度的嚴重誤讀。根據《基本法》第八十八條，香港法院的法官由行政長官根據當地法官和法律界及其他方面知名人士組成的獨立委員會推薦而任命。法官的免職亦有嚴格程序，須經審議庭審議並提出建議。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更須徵得立法會同意。這套制度確保法官的選拔基於司法和專業才能，而非政治考量。將行政長官的憲制任命權曲解為「政府挑選法官」，無異於無視推薦委員會的獨立運作和《基本法》的明確規定，是對香港司法制度運作的刻意扭曲。

最後看「營商環境」。外部勢力最樂於渲染的論調，莫過於「國安法嚇走投資者」「香港已非經商之地」。然而數據是

最有力的反駁。截至2025年底，母公司在海外或內地的駐港公司超過11070間，數目創歷史新高。香港的外來直接投資流入金額高達1260億美元，排名全球第三位；香港再度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全球競爭力更躍升至全球第二位。這些排名與數據背後，是國際投資者用腳投票的結果。

試問：若香港真如外媒所言「不宜經商」，何來逾萬家跨國企業以香港為基地？何來外來直接投資屢創新高？事實恰恰相反——國安法律的實施令香港恢復安寧穩定，而法治與穩定正是投資者最核心的考量。

若無法治何來最自由經濟體？

外部勢力對香港國安案件的每一次「關切」，都不是出於對香港法治的真心維護，而是將香港視為遏制中國發展的棋局中的一枚棋子。他們口中的「司法公正」，只有在判決符合其政治利益時才被認可；他們高呼的「人權自由」，不過是美西方在

港政治代理人的「自由」。將國安案件審理污名化為「司法受控」，將指定法官制度曲解為「行政干預」，將陪審團安排選擇性放大為「權利剝奪」，這些論述的共同邏輯是：**凡是不符合西方政治預期的司法裁決，便是「不公正」的。這種以政治立場取代法治標準的思維方式，本身就是對法治精神的最大諷刺。**

外交部發言人林劍日前指出，「支聯會」案的各被告犯罪事實清楚、危害嚴重，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打擊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合理合法，香港是法治社會，中央政府堅定支持香港特區依法維護國家安全、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事實一再說明，外部勢力的抹黑與唱衰，改變不了香港法治日益鞏固的事實，也阻擋不了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持續綻放獨特優勢的步伐。對於那些習慣於對香港事務指手畫腳的人，不妨多看看客觀數據，多聽聽在港外商的心聲——他們對香港法治的信心，遠比遠隔重洋的政治口號來得真切。

維護高水平安全須久久為功



李穎影 議論風生

香港進入從亂到治邁向由治及興的關鍵階段，社會各界對未來

發展充滿期待，這既是民心所向，也是大勢所趨。然而，有人卻把維護國家安全與推動經濟發展對立起來，聲稱維護國安工作已大致完成，香港應專注發展經濟。這種說法看似合理，實則是將安全與發展割裂，為反中亂港勢力及外部敵對力量留下可乘之機。對此，近日《大公報》刊登的龔之平系列評論，強調安全與發展相互依存、不可分離，為香港在新階段把握方向提供重要啟示。維護國家安全從來不是階段性任務，而是支撐香港由治及興全過程的基礎工程。

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即使社會回復穩定後，也不代表相關責任的削弱。從法律執行角度而言，香港國安法與《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共同構築起特區的國安法律屏障，法律本身應被視為制度建設的起點，而非終點。任何法律要具備持續的規範力，必須依靠常態化的執行機制、深入社會的守法文化，以及與時俱進的風險識別能力。

「法律生命在於實施」

國家安全法律所針對的，並非某一時期的特定亂象，而是所有危害國家主權、統一與領土完整的行為與活動。此類威脅具有高度變異性與隱蔽性，法律的落實亦必須保持長期、穩定而不鬆懈。若誤以為立法完成便可高枕無憂，等同將法律視為靜止的展示品，忽略了「法律生命在於實施」的基本法理。

香港特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管治團隊與全體居民均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這個責

任不會因階段性成果而減輕，更不會因為發展任務而擱置。依法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安行為，既是香港特區向中央負責的具體體現，也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根本保障。

將安全與發展對立的思維，屬於非此即彼的誤解。高質量發展所依賴的社會條件，正是高水平安全所提供的穩定預期與法治秩序。若一個社會缺乏基本安全保障，資本必然遠離，人才勢必流失，國際信譽亦會迅速崩塌，任何經濟規劃與民生工程都將成為空談。

2019年，反中亂港分子打着所謂「自由民主」的旗號，卻以暴力摧毀公共秩序、癱瘓政府運作、衝擊經濟命脈，令香港國際形象受到重創，投資者信心跌至谷底，市民日常生活全面受阻。正是中央果斷制定香港國安法，才得以迅速止亂、恢復秩序，使香港重回發展正軌。

事實證明，安全不是發展的對立面，而是發展最堅實的基礎。今日香港經濟自由度蟬聯全球第一，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穩居前列，跨國企業與家族辦公室紛紛落戶，皆因香港重建了法治信心與穩定。**若認為安全工作可以暫放一旁，表面上看似是騰出更多精力發展經濟，實際上卻是在削弱發展根基，最終必將得不償失。**

當前，香港面對的內外威脅依然嚴峻，任何鬆懈都可能造成難以挽回的後果。從內部看，亂港勢力轉向更隱蔽的「軟對抗」，妄圖借民生議題煽動不滿引發動盪。從外部看，美西方敵對勢力從未放棄「以港遏華」圖謀，從未停止干預香港事務，試圖妨礙香港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高水平安全本身就是香港高質量發展的核心競爭力，而非外在附加的成本。美西方一方面試圖將維護國安置於香港發展的對立面，另一方面卻

制訂嚴苛的國安法律，實乃雙重標準。「背靠祖國、聯通世界」是香港的獨特優勢，而要讓這一優勢得以充分發揮，前提正是香港始終對維護國家安全保持高度負責。

只有當國際投資者確信香港具備法治彰顯、秩序穩定、不受政治動盪威脅的市場環境，他們才會放心將資金與業務長期留在香港。近年大量國際金融機構擴大在港布局，全球頂尖人才選擇來港發展，正是對香港安全環境投下的信心票。安全所帶來的穩定預期，本身就是最稀缺、最具價值的制度性公共產品。

特區政府在堅定維護國家安全的同時，亦同步推動多項發展舉措：北部都會區加速建設，國際創科中心初見成效，民生投入持續提升，充分證明安全與發展本就是同向而行、相互促進的關係。將安全視為發展的負擔，不僅在理論上站不住腳，在實踐中更與香港的真實經驗背道而馳。

發展碩果印證安全價值

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本質上是一場深層次的制度重塑與治理升級。在這進程中，維護國家安全不是某一階段的特殊任務，而是貫穿全程的根本要求。香港社會必須從法律義務的高度、治理邏輯的深度、鬥爭形勢的嚴峻性以及制度建設的長效性出發，全面準確把握安全與發展的辯證關係。

香港的未來並非在安全與發展之間作取舍，而是在更高水平的安全保障下推動更高質量的發展，以發展的累累碩果印證安全的深遠價值。唯有如此，香港才能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新征程中發揮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讓「一國兩制」在新時代展現更為蓬勃的生命力。

執業律師



陳成爐 議事論事

首屆全球獨角獸大會於8月24日至25日在香港舉行。深圳的機器人、上海的光計算芯片、北京的生物醫藥等內地科創企業齊聚香江。這不僅是一場資本的盛宴，更是觀察中國硬科技全球化路徑的重要窗口。正如行政長官李家超所說，香港是獨角獸企業出海「最強跳板」。當「香港研發+灣區製造+全球市場」的協同模式從藍圖走向實踐，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價值正被重新定義——它不僅僅是融資通道，更是產業鏈升級與全球化布局的戰略樞紐。

香港獨特價值系統性升級

逐際動力、智元機器人、五和博澳、光本位智能……這些來自內地不同城市的獨角獸企業，赴港目的已遠不止於融資。逐際動力半年內已完成兩輪融資，累計吸納近4億美元，得到了來自中東、歐洲、東南亞及美國資本的關注。其投資者關係負責人直言，希望扎根香港，獲得更多海外客戶關注；智元機器人擬將國際研發中心落戶北部都會區深港創科園，正與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籌建聯合實驗室，期望利用香港的國際化舞台，帶動產業鏈轉型升級；五和博澳已向港交所遞交上市申請，將香港視為進入國際市場的橋樑。

這些選擇背後，是香港獨特價值的系統性升級。過去，香港主要扮演「資本窗口」；如今，它正成為涵蓋研發、品牌、人才、標準與全球化布局的全周期加速器。智元機器人董事長將香港形容為「跨海橋樑」——這一定位精準道出了其不可替代性：對內連接大灣區完整產業鏈，對外對接國際規則、資本與市場。企業用腳投票，本質上是對香港「超級增值人」角色的深度認同。

投資機構的布局進一步印證了香港科創生態的質變。上海予騰私募基金啟動「維港紐帶科創基金」，首批簽約的9個儲備項目全部來自香港高校。其管理合夥人表示，香港特區政府對科創的重視程度已發生根本性變化，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構建覆蓋基礎研究、中試驗證到產業化的完整政策體系。

這正是香港系統優勢的生動體現：高校提供「從0到1」的源頭創新，大灣區內地城市提供

「從1到100」的工程化與規模化能力，國際資本提供全周期的資金支持。上海光本位智能科技的布局思路頗具代表性：「立足香港，鏈接大灣區」，圍繞科創空間、產業賦能、生態共建，推動AI算力的「新能源革命」。這種「香港窗口+灣區製造」的模式，正在成為硬科技企業的共識路徑。

胡潤研究院《2026全球獨角獸榜》顯示，全球獨角獸總數達1603家，總估值54萬億元人民幣，大灣區擁有80家。其中香港5家、深圳44家、廣州24家。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更指出，過去10多年，香港已成功培育出20家獨角獸企業。

熱鬧背後亦有冷思考。香港不缺制度設計，缺的是制度紅利的充分傳導。它擁有五所世界百強大學的科研底蘊，國際金融中心的資本縱深，自由港的制度便利，更擁有大灣區內地城市完整產業鏈的戰略腹地。但如果跨境資金流動、人才往來、數據流通的堵點不能有效清除，這些優勢就難以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培育效能。首屆「港深創科園培育計劃」已啟動，河套「一區兩園」正在試行創新便利措施，但這些探索仍需更大膽的制度突破——尤其是在跨境資本便利化、科研數據安全流動等方面。

中國市場的「超級入口」

首屆全球獨角獸大會的意義，不僅在於讓200餘家獨角獸企業齊聚香江，更在於向世界展示了香港從傳統金融中心向國際創科樞紐轉型的決心與路徑。這裏不僅是內地企業走向全球的「跨海橋樑」，也是全球創新力量進入中國市場的「超級入口」。

當「一國兩制」的制度紅利與大灣區的協同紅利在這裏疊加釋放，當基礎研究的「最先一公里」與產業化的「最後一公里」逐步貫通，香港培育更多更好獨角獸的未來值得期待。正如大會主題所言——「天生驕驁 創領未來」。這不僅是願景，更是香港正在書寫的現實。未來的考驗，不在於能否吸引更多獨角獸落地，而在於能否讓「香港研發、灣區製造、全球市場」的閉環真正高效運轉，讓制度優勢轉化為持續的創新動能。江西省政協委員、江西省旅港同鄉會會長

美對伊「經濟放逐」是黔驢技窮

軒轅靖觀世界

8月24日，美國啟動對伊朗的「經濟放逐行動」，發布新一輪極限施壓措施，涵蓋航空、數碼資產、黃金、航運和技術五大領域。暫停多項涉伊許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動、個人匯款、體育和學術交流等。並將60個伊朗相關實體、個人和船隻列入制裁清單，覆蓋核與導彈技術、網絡行動、石油貿易等領域。美更警告各國停止與伊朗經濟往來，否則將面臨被移出美元體系等嚴厲後果，並稱不再容忍「灰色區域運作」。

嚴重破壞國際貿易基本秩序

對此，美國財長貝森特宣稱，對伊制裁旨在「扼殺」伊朗政府每條經濟生命線，直至其被完全孤立，任何為伊朗洗錢的實體將被移出美元體系。特朗普總統則將這一輪制裁稱為伊朗的「經濟諾曼底登陸日」。

不過，美國對伊「史上最嚴厲」的制裁組合拳，與其說是戰略主動，不如說是黔驢技窮。

所謂的「經濟放逐」不過是美軍軍事手段無效後的戰略退卻。美伊對峙已持續近6個月，美軍對伊空襲頻次近幾周明顯減少，有報道稱部分武器庫存已消耗殆盡。因此，美國不得不選擇成本相對較低、政治風險較小的經濟封鎖。雖然特朗普表示這不意味着軍事選項受限，但事實是，如果軍事手段真的管用，美國又何須祭出所謂「經濟放逐」？

首先，美國對伊「經濟放逐」嚴重違反國際法與國際道義。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強調，美國此舉是向所有聯合國獨立成員國「宣示治外法權式的主權」，這種次級制裁在國際法中根本找不到依據，本質上是將國內法凌駕於國際法之上，強迫他國服從美國的單邊意志。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當前不僅單方面制裁伊朗，還試圖脅迫

全球各國協同跟進，依託「長臂管轄」與「二級制裁」施壓第三方，明顯違背國際法準則，嚴重破壞國際貿易基本秩序。

其次，伊朗的回應與反擊將使華盛頓的如意算盤落空。伊朗成為美國軍事上難啃的硬骨頭，被美國制裁幾十年的伊朗也對美國的經濟制裁「脫敏」。針對美國對伊「經濟放逐行動」，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表示，美國「應改變與伊朗打交道時的言辭和做法」，依靠強權和霸凌只會使相關進程更加複雜。伊朗最高領袖顧問穆赫貝爾表示，面對美方威脅，伊朗的回應將比以往更加堅決。伊朗經濟和財政部長馬達尼扎德直言，世界金融和經濟命脈並非如此簡單，美國不可能「完全切斷伊朗的金融和貿易聯繫」。

必須指出的是，伊朗手中始終握有霍爾木茲海峽這一關鍵籌碼。伊朗方面已明確警告，如果美國經濟戰持續升級，將全面切斷波斯灣的石油出口。伊朗伊斯蘭議

會議長卡利巴夫則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知道沒人會相信他們的胡言亂語，美國在經濟上已無力進一步限制其他國家的關係。伊朗近半個世紀以來一直在制裁中生存，早已建立起龐大的規避網絡，美國越是收緊絞索，伊朗越是能找到新的出口通道。

其三，美國所謂「經濟放逐行動」也是多敗俱傷之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制裁確實給伊朗帶來了沉重代價，伊朗今年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將萎縮5.4%，消費者價格指數上漲68.9%。伊朗7月年化通脹率達到66%，消費者價格指數同比上漲87.9%，其中食品價格同比上漲128%。

放逐美國國際信譽戰略耐心

更重要的是，美國也無法在「經濟放逐行動」中獨善其身。研究機構測算，如果霍爾木茲海峽關閉一個季度，紐約商品交易所輕質原油期貨價格可能升至每桶94美元左右；推動美國第四季度通脹同比提

高約0.6個百分點。

可見，美國對伊制裁越嚴，全球能源供應越緊張，美國消費者和企業承擔的成本就越高。美國試圖讓伊朗為經濟戰「埋單」，但也推升了美國通脹，影響了美國人的加油價格和家庭餐桌。

從軍事打擊到「經濟放逐」，從「極限施壓」到「史上最嚴制裁」，美國對伊「機關算盡」但並未讓伊朗屈服，也未達到戰略目標。特朗普所謂對伊「前所未有的經濟戰和經濟孤立」，不過是黔驢技窮之後重新翻出的一套舊牌。

當軍事威懾失靈、外交談判停滯、盟友離心離德、國內民怨沸騰之時，美國對伊「經濟放逐行動」與其說是對伊朗的致命一擊，不如說是美國霸權氣急敗壞的笑話。正如伊朗所言，美國對伊朗的「經濟放逐」，放逐不了伊朗，卻放逐了美國的國際信譽與戰略耐心。

國際關係學者